

發言稿

「服貿」經濟治理中的社會／族群影響

張翰璧

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

關於《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》（以下簡稱「服貿」）經濟治理中的社會／族群影響這個議題，我比較是從理論的架構去理解。換言之，我們應該用什麼樣的概念架構去理解「服貿」爭議，以及「服貿」爭議對客家文化相關產業有什麼樣具體的影響？我大概就從這兩點來談。

一、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問題： 經濟危機、政治爭議與社會文化問題

由於長程運輸器、網際網路等科技的快速發展，跨國、跨洲活動頻率的增加，造就了所謂的全球化現象，處於世界性資本主義體系內的國家總須完成積累（accumulation）與正當化（legitimation）兩項功能，前者指維持或創造有利於資本積累要求的環境；後者則指維持或創造能達到社會和諧的條件，兩者間存有難解的矛盾（O'Connor 1973: 6-8）。國民經濟一直是冷戰結束前世界經濟的基礎。國家機關也必須重視經濟競爭結果所造成的相對利得（relative gains），以及相對利得是否對本國在體系內所處位置之變化、或國力之升降造成影響（Moran 1996: 184）。國家即使在制訂經濟政策時，也必須整體考量國家發展、安全甚至國族文化存續等因素，不能將之簡單化約成如同企業間的經濟

競爭邏輯。

後冷戰階段的世界秩序，越來越以經濟的國際分工為基礎，投資貿易生產行銷等經濟活動以超越國界的特性，帶動其他層面的民間社會互動也有更不受主權國家管制的態勢，總是呈現動態變遷且方向歧出的特性。以 1997 年的金融風暴為例，全球資金的快速流動，將亞洲各國的經濟推入谷底，並且動搖了若干政權的合法性與正當性。印尼的排華暴動就是最明顯的例子，將全球經濟的階級問題轉化成國內的種族衝突，凸顯出國家統治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問題。

Habermas 在 1973 年出版的《晚期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問題》一書中即指出，近代資本主義的國家面對合法性的問題（Habermas 1973）。所謂合法性的兩個層面，一是合乎法律的統治，二是正當性，也就是合理秩序的信仰。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危機，在於政治系統不但將範圍擴展至經濟系統，甚至擴展到社會文化系統。當經濟、政治系統無法解決系統內部的問題時，社會與文化就成為決戰的場域。

以 1997 年的金融風暴為例，必須放在一個經濟全球化的脈絡之下討論。因為在印尼整個 5 月暴動裡頭看到的，是全球資金流動的影響，將印尼的階級問題轉化成族群衝突。所以那時候看到非常多的反華暴動，基本上我們把這個現象叫作「階級問題族群化」，也就是原來是階級的問題，現在把它變成是一個族群的問題。我覺得這個階級問題族群化，也會發生在「服貿」架構下臺灣與中國的貿易紛爭中。因為臺灣跟中國大陸間，原來就有統獨的爭議，如果在這樣的脈絡裡產生經濟利益的衝突，我覺得它會更明顯。

可是從哈伯瑪斯的架構來看，經濟問題不只是政治問題，它還是一個文化的問題。為什麼？它為什麼會變成一個文化的問題，或是一個正當性或合法性的問題？哈伯瑪斯這一本書，就是從晚期資本主義的合法

性問題去談兩個問題，一個叫合法性，一個叫正當性。合法性就是合乎統治的一些法律規範，正當性基本上，是社會的共識，或是社會對於政權的服從性。但是問題不在這裡，它把社會危機，即，後資本主義的社會危機，放在四個構面裡頭來看，分成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領域。哈伯瑪斯告訴我們：「經濟問題它不會純然是經濟問題，它會轉化成政治問題、社會或文化衝突」。譬如，以前述印尼的例子來看，當金融風暴來的時候，印尼所有人的經濟都出現問題，但是廠長早就落跑了，它牽涉到跨國企業所引發的危機，以前我們沒有跨國企業的時候，還可以去跟廠長抗議，去跟資本家抗議，可是在全球資本主義的運作之下，其實搞不好廠長是一個更被剝削的勞動，因為資本家支付了更高的薪水給他。

當經濟問題沒有辦法在經濟領域中透過它的邏輯解決的時候，它的危機會轉化為國家的問題。在印尼的例子中，國家的問題就是，當時的蘇哈托沒有辦法解決金融危機帶來的經濟影響。再加上，他因為經濟不好，要縮減國家的財政支出，所以取消了水電等基礎補助的一些措施，這就使得所有經濟問題更惡化。在經濟問題更惡化之後，所以民眾開始跑去跟蘇哈托抗議，就是政治上產生了一些正當性跟合法性的問題，但他也沒有辦法解決。這時，整個社會就產生暴動，對這樣的暴動，社會也沒有辦法自己解決，所以就轉化成文化問題，變成印尼人跟華人之間的衝突。這個問題非常的赤裸，而且非常嚴重，意思就是，當經濟問題沒有辦法解決的時候，它會轉成政治問題，政治問題沒有辦法解決的時候，社會的共識或整個社會運作的和諧性就會被破壞，如果這個社會的共識又瓦解了，然後原來的國家脈絡裡又有一些族群問題時，整個階級的問題就會變成族群化。

二、「服貿」爭議與客家文化

所以哈伯瑪斯最後在全球化的理論中講了一句話，這句話其實到現在我都覺得蠻貼切的，他說：「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危機，在於經濟系統不但擴張到政治系統，甚至擴展到社會文化系統裡面。那到了最後會變成什麼樣一個狀況？就是說經濟跟政治問題無法解決的時候，社會跟文化就會變成一個決戰的場域。」我覺得這句話很重要，為什麼文化會變成一個決戰的場域？它跟客家的關聯性是什麼？

我自己這幾年在進行東南亞研究的時候，看到臺灣跟東南亞客家認同的一些轉變，就是說，我們可以看到東南亞的客家認同其實有兩個來源，或說東南亞客家文化建構的內涵其實有兩個部分。一個就是中國的祖籍認同，另一個其實是臺灣的客家文化。很多人是到臺灣來學什麼叫作「客家」，譬如說，什麼叫客家菜？什麼叫客家文化？這是因為客委會每年都會邀請他們來這邊學做客家菜，或來這邊學客語等。所以臺灣這幾年，尤其是客委會，變成客家文化輸出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機構。這樣子的一個文化輸出，尤其是在東南亞我看得非常清楚，就是說在整個東南亞客家文化的建構裡面，不但有一些中國的架構，還有臺灣客家文化的內涵，這個文化的場域在「服貿」進來之後，我覺得它會有一些轉變。

臺灣其實在整個的社會自主性建構的過程裡面，已經慢慢建立起來所謂臺灣客家的論述，這樣子的臺灣客家論述是建構出來的。上述的概念架構，可以用來分析或理解「服貿」架構將會產生的社會與族群文化的影響。老闆換成中國人的背後，代表的不但是一個產業的掏空，也意味著文化特質的改變，經濟所產生的階級性會與統獨的政治主張逐漸重疊。對於客家族群的影響，尤其是「文化」創意產業，都將受到影響，

「在地」的客家文化論述，變成「中國原鄉」的祖籍論述，直接跳過「臺灣」。

從經濟層面來看，我可以看到東南亞的客家經濟領域裡面，有所謂的客家產業，或者是客家職業。可是在現在的臺灣，因為整個社會經過民主化以及多元文化的發展，臺灣的客家產業或是客家的職業已經漸漸消失，許多客家文化的發展其實是跟文化產業連結在一起。也就是說，臺灣很多的客家產業，是必須要透過建構的方式去推展的，那麼文化的概念在這裡就非常重要，這跟哈伯瑪斯的那句話也會連結在一起。

換句話說，整個產業的發展過程中，如果換了一個老闆怎麼辦？很多人說換了老闆好像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，可是換了老闆之後，其實整個企業文化是會被改變的。當整個企業文化被改變，它其實就可以透過文化的論述去建構什麼是客家文化，它可以不要去反對臺灣，可是它可以直接從地方，譬如說交大客家學院的圓樓，直接跳到中國大陸的客家文化，直接跳過臺灣這一層，和中國的客家歷史與文化產生連結。所以我們說，當一個老闆被換掉的時候，其實是很有可能整個文化會被換掉，企業文化或商品故事會變成是中國論述的建構，這個中國的論述其實是非常非常的龐大。

三、代結語：消失了的臺灣？

所以「服貿」不僅僅是「服貿」，「服貿」對於客家相關文化跟產業的具體影響，就是所謂的企業文化與商品故事的改變，它代表的不但是一個產業的掏空，也意味著文化特質的改變。剛剛長鎮舉的比利時、義大利的例子中，它們的國家都還在，可是我們的國家可能就不在了，就是它直接跳過臺灣，臺灣就會不存在，即，臺灣的主體性可能就會沒

有了。所以，如果這樣子的一個客家文化產業，它創意的論述會受到中國影響的話，在地的客家文化論述就會變成中國原鄉的主題論述，這個是我覺得從東南亞的例子中可以看到。當它直接跳過臺灣，不管它是變成一個異文化的經歷，或者變成一個什麼樣的在地文化論述，在這個過程裡面，我覺得臺灣的這個層次都會不見。

參考文獻

Habermas, Jurgen, 1973, *Legitimationsprobleme im Spaetkapitalismus*.

Frankfurt am Main: Suhrkamp.

Moran, Theodore H., 1996, "Grand Strategy: The Pursuit of Power and the Pursuit of Plenty." *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* 50(1): 175-205.

O'Connor, James, 1973, *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*. New York: St. Martin's Press.